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七期 ——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1a)

【追根溯源】	红卫兵暴力	尚德塞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十四)	孙怒涛
【难忘岁月】	直面良知: 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下)	孙 耘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追根溯源】

红卫兵暴力

• 尚德塞 •

红卫兵暴力, 是文革罪孽的重要部分。红卫兵暴力, 是从文革批斗和破四旧开始的。而這些暴力, 正是源自毛泽东的鼓动。

毛泽东的思想鼓动——

1964—1965年间, 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不满成为一个社会宣传热点。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进行文化大革命通知, 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以“红卫兵”即“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社论。6月初, 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 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第25中学等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 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与校方就功课内容治校方式等发生冲突, 违抗校规抵制正常教学, 形同“造反”, 很快成为时潮运动。

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共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 为制止“事态”的进一

步扩展，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有利的范围内。很快工作组与学生产生对立矛盾，并不断升级。

1966年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在《人民日报》国际时评《汉弗莱的哀叹》一文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泽东论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谁都未想到，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故意更深设陷工作组。就在大家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2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等不由愣住了。毛泽东的话如何反得？

就在工作组考虑如何应对时，红卫兵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至此，红卫兵三篇大字报完成了“革命造反”宣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的修正主义”，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宣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而为此等张狂托底的正是毛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没有想到，他原本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的摘句，27年后居然被红卫兵当做向中共发动革命的“道理”，在欲图摧毁中共现体制的文革本意上苦苦寻找思路的毛泽东，在红卫兵的革命疯狂上意外找到了突破点。

7月17日，毛泽东，畅游长江之后，回到了中南海。返京后，他听取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的汇报。江青、陈伯达一伙在毛泽东面前大加指责工作组的错误，罗列种种罪名，竭力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而清华附中红卫兵前两篇大字报7月28日前后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亲笔撰写了回复，即《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会议第二个文件下发并附有清华附中的几份大字报内容。那时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停课开展文革两个月。

8月2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接到电话得知毛泽东回信，8月3日，王任重将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召至钓鱼台，传达了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说：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这种不辨红卫兵大字报实质是对中共体制挑战而只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语气腔调，不啻将红卫兵矛头所指中共社会等同封资修统治的社会，从而正式确认27年前对当今物是人非的论语被红卫兵合理运用。共产党社会“造反有理”，即便1957年最

激烈最“反动”右派分子想都不敢想、说了就能被毙杀的“道理”，时隔不到10年居然成了最革命的召唤，一个随着毛泽东意志转移多么正误颠倒的国家！而这个颠覆性口号正是毛泽东从思想上鼓动红卫兵造反革命走向暴力最重要的第一步。

三篇大字报8月被《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全文刊出，吹响全国文革群众运动的冲锋号角。同时在毛泽东默许的革命风潮下，文革吹鼓手们将毛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谱成“毛主席语录歌”中的两首，既从感性上鼓动暴力崇尚，更为暴力实施提供了“一句顶一万句”式不容置疑的历史结论和理论依据，成为文革最著名最疯传的暴力颂扬歌曲。

一个原本人微言轻只待社会打发的青年群体居然成为最高领袖的掌上明珠，一跃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角的红卫兵，为了回报最高统帅毛泽东的青睐和鼓动，必然实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造反行动，除了用突破人性的狂野暴力再没有更有力的行为能对伟大领袖表示忠诚了，红卫兵即将掀起的暴力狂潮，已是任何人任何语言都无法遏阻的了。

毛泽东的权力鼓动——

在毛泽东的强力命令下，工作组被撤销而红卫兵组织趁机在各学校掌权。革命创意激情无限的红卫兵喊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牛b口号，将毛泽东授权的造反革命变成大规模的校园暴力行动，也是毛泽东鼓吹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变成群体思维的必然结果。这种思维下，唯革成性的红卫兵顺理成章只允许优等阶级的“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依仗无产阶级的高等权势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套施暴团伙方式，在清华附中最早成型。就在红卫兵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建立了校园“专政队”，对领导干部和教员“劳改”，并且以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挂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蛮殴打。校长万邦儒被打得肾脏出血，头上被打出裂口长期不能愈合。副校长韩家鳌的头被按在火盆里烧，打伤后不准就医。红卫兵强迫老师和干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楼的阶梯平台上挨斗。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编曲成歌狂吼撒野，施暴所谓“家庭出身黑五类”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里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就在毛泽东复信红卫兵鼓动造反有理后的8月8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要被批斗的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也是在毛泽东复信后，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

12天以后，就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10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里。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复，由父母照顾。

校园暴力，红卫兵冲击现有秩序的”创举“和”大无畏“已经成为毛泽东必欲赞之而大力推行的革命行动。早在6月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吹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打人之风刚开始时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坏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

1966年8月8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十六条》再次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毛泽东通过16条再次鼓动红卫兵，”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而对社会上对红卫兵暴力的不满和批评，毛泽东还是通过16条一方面轻描淡写一方面则强词夺理说，“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在这里，着重强调红卫兵“大方向正确”的“革命主流”上，更惹人注目令人激奋蛊惑人心，远比毛泽东对红卫兵复信“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们”的说词和16条中所谓“要文斗，不要武斗”式劝告更有鼓动力，已经蔓延成风的“武斗”成了大方向正确就可以不计轻重的“缺点”。

8月18日，就在红卫兵野蛮暴力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那些手上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打手骨干们第一次亲身领受伟大领袖的宠幸，这种实质等于放纵暴力在造反革命的火爆场面面前，所谓“不要武斗”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苍白无力，已经变成了没人追究没人当回事的最虚伪的纸面文明。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开始了文革要破除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暴力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扫除奇装异服剪小裤腿收型服高跟鞋，取消修指甲、美容、烫发、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甚至花色发卡等日用商品，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搜查财宝反动物品……。这股狂潮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从城市赶走地富反坏右资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打擂台似的比试革命功夫，看谁更黑更狠更残暴。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神符魔咒。

在毛泽东文革运动调度下，新闻舆论对红卫兵暴力大加赞赏大力吹捧坚决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声扬“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就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有发表了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唯恐文革暴力不达其极。

这些打砸抢烧抄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广大群众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转公安部由毛泽东批阅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而全国的警察只能无奈地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打砸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其行。

毛泽东的直面鼓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红卫兵头目纷纷登上天安门城楼拜礼，这些早期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几乎全是中共高干子弟。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表示“彬彬”不好，说“要武嘛”，赤裸裸鼓吹暴力尚武思想。818大会向全国实况广播和新闻片放映，各地红卫兵纷纷效仿改名，而改名形式下的暴力言行已是最高统帅直接鼓动下不可遏止的狂潮。

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后从未有过的名望损失和党心散落，毛泽东重振权势的欲望日盛一日。红卫兵造反革命对人性道德社会文明的暴力毁灭性行动，对毛泽东已经无法满意的中共党国秩序的巨大冲击，使他意外收罗到了他有心无力梦寐以求苦索不得彻底推翻中共体制的体制外力量。红卫兵的暴力，是毛泽东重造中共体系非走不可的破坏程序和心理调整，红卫兵暴力满足了毛泽东破旧立新重新再来的野心和欲望。毛泽东的鼓动成为红卫兵暴力的源头，就是因果明确的历史必然。

□ 原载《共识网》2013-8-23

~~~~~

### 【劫后反思】

####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四）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1 0 a，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967. 6—1968. 9））

#### 第十五节 4 1 4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我稀里糊涂拍的板

1967年8月22日下午，414正在中央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组长会议，议题是讨论全国形势，讨论大批判如何深入。这样的会议，只要有空，总部委员都会参加的。只是，这期间外出的总部要员比较多，沈如槐就因为去外地没出席这次会议。

我、汲鹏、龙连坤等坐在前排，便于商谈和掌握会议。会议从二点左右开始，到四点多钟，快结束了，忽见蒋南峰从外面快步进来对我们说，今晚外面有一个行动，问我们参加不参加。

蒋南峰是414的对外作战部部长，凡社会上的事情都是由他在负责的。

我们叫他说详细点，他叫与他同来的一位姓汪的女同学给我们几个总部委员介绍情况。她说，她参加地派外事口的“反帝反修联络站”，联络站决定今晚搞一个全市性统一行动，到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抗议集会，声援港澳同胞的反帝抗暴斗争。如果参加，派个200人左右的队伍就可以了。

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觉得可行，都同意了。我想，这是反帝的行动，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我叫她到会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总部的几个人在下面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她在台上讲了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后，又提了几点注意事项。她说，去的人最好穿黑色的衣服，带一些诸如改锥、虎钳之类的工具，带一个书包，如有文件就装到书包里带出来，以便

搞到英国人在中国搞间谍活动的罪证，那样他们就无法抵赖了。

这些注意事项都是她从联络站那里听来传达的。台下的人听到这些，顿生疑窦，纷纷给我们递条子，有好几张。问，为什么行动搞得那么神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次行动中央同意没有？当时我们心里也有点嘀咕，于是又商量了一阵。我们猜测可能是要冲进去。那个时候，冲这冲那的都是平常事，冲进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别的造反派连国家机关、军队大院都在冲，都可以抢档案的，这个小小的帝国主义的代办处有什么了不得的？冲不得的？

在场的总部委员有的虽然有一点疑虑，但是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大家都看着我，意思是要我拍板决定。

如果有沈如槐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只发表我的意见供他参考，最后的拍板肯定是由他来做。他是一把手，掌控全局，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也多。现在他不在，我是二把手，不想拍板都不行。

我本人是同意这次行动的。因为，明摆着，行动的矛头是对着英国佬的，大方向肯定没错，是一次革命行动。这次行动要是不知道，没碰到，那是另一回事。既然知道了，碰上了，能不参加吗？

团派常常在社会上搞轰动性的大动作，其影响是414没法比的。414难得有在校外出头露面的机会。虽然这次行动不是414策划、组织的，也不是主角，但是要是能参与进去，给中国人长志气，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也是给414长脸呀。

况且，在场的总部委员最多是有点疑虑，并没有反对意见。他们等着我拍板，只是尊重我罢了。如果因为对这次行动的具体做法有点疑虑而不敢参加的话，那我在大家的眼里真的是一个连一点责任都不敢承担的胆小鬼了。

于是，我跳上台去，宣布414参加今晚的反帝革命行动，由龙连坤和数力系的分部头头带领200名数力系的414战士前往（总部委员讨论的时候没委任蒋南峰带队，他说他是临时被人拉上车参加了这次行动）。我没有对递上来的条子做解释。因为我不知底细，也没有时间去搞清楚，所以解释不了。我只是要求参加行动的人服从指挥、相机行事。

实在说，我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只想着大方向这一点。根本就没有想到，使领馆，相当于外国在中国的“领地”。非法闯入国家机关、军事要地，怎么讲也是内政，而非法闯入使领馆，就是外交事件了。也没想想，有那么多人参加的抗议集会，万一场面失控，怎么办？

当天晚上，果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事件的前因后果大致是这样的：

1967年8月，港英当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几家左派报纸，并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多名记者及报社工作人员。8月20日，外交部（此时已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夺了权）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限令48小时内解除对报纸的封查令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通牒。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外交部造反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与北京高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联合，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8月22日晚，联络站组织了一万多人，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

为由，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然后，包括4 1 4在内的多个造反派组织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也越过围墙，突入院内，进行打砸抢活动，殴打了英国代办和工作人员，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2 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极其气愤，提出严厉批评。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第二天，我在动农馆的4 1 4总部会议室里，听了龙连坤的汇报。他大发牢骚，对这次行动非常不满。他说现场秩序很乱，多次广播总理的指示，都不听。别的红卫兵带头一冲，4 1 4的队伍也被冲乱了，失去了控制，随了大流。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感觉有点不妙。

随后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第四版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从字面看来，这个行动是得到中央肯定的，我心稍安。

再后来，陆续听到了一些中央首长对这次行动批评的消息。我心想，大方向是对的，最多是有点过头了。我们对这件事一直没有做过像样的检查。即使后来的大联委的学习班上、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虽然做了点检查，也是很肤浅的。

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的内乱，这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也就是隔岸观火瞧瞧热闹而已。现在，居然连最起码的国际惯例都不顾，把别国的代办处给烧了。这样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为什么以温和著称的4 1 4也积极参与这一的极端行动？为什么以反极左思潮为旗帜的4 1 4干起极左的行径来一点也不比团派逊色？根本原因在于在文革的左倾路线下，极左思潮无孔不入，侵蚀每个红卫兵组织和个人。4 1 4未能幸免，我也深受其害。我根本就没有“外交无小事”这根弦。虽然反感打砸抢活动，但是觉得对帝国主义的代办处，即使冲冲打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4 1 4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铸成了“四派自身历史的最大耻辱”。是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应当承担全部领导责任！至于事后受到严厉审查和追究的如蒋南峰、姓汪的女同学，他们都只是具体的经办人员，责任不在他们。

在清查五一六中，我如实地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我在其中的作用。奇怪的是，专案组对我的这件事并没有过多的追究。相反，并非应该由我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揪刘火线”，在我的清查结论中反倒榜上有名。

## 第十六节 毕业分配，我与杨继绳的各自际遇

1 9 6 7年春，我在大字报区看到一则“6 6届毕业生串联会”的公告。公告声称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1 9 6 6届大学毕业生能尽早毕业分配。

从“八八串联会”、“八九串联会”开始，不同名称的串联会常常出现。譬如，总部整风的时候就有“整风串联会”。这些串联会都是政治性质的。像这样与文革运动无关仅为某个特定目标而结成串联会的，这是第一个。新鲜！

那时，我的革命热情正高涨着呢，看到一些人嚷嚷着要毕业分配，有点不解，也有点不屑：怎么觉悟这么低的呀？在毕业之前遇上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怎么不好好参加，还想打横炮干扰呀？

我也就是想想而已，没去理睬它。那时我正忙于与总部论战，忙于414的事情。

没想到“毕业生串联会”的生命力还挺强的，得到了绝大多数6字班毕业生的拥护和支持。团四两派在政治观点上尖锐对立，但是6字班的老团老四在毕业分配上的立场高度一致，大家都想快点毕业离校参加工作。

想想也是，对于6字班的大学生，如果文革推迟二三个月，早就毕业分配完毕，到工作单位报到去了。每月46元（北京地区标准）的见习工资也早已拿上，能自食其力，不再依赖父母了。该找对象的就找对象，该结婚的就结婚，该干嘛就可以干嘛。

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聂元梓的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把我们如期毕业的美梦给毁了。

原以为运动搞上一两个月，顶多一年半载就会结束，现在看来遥遥无期。

6字班这些应届毕业生，正常的都读了18年的书，年龄都已经到了25岁左右，大一点的近30岁了。1966年至1967年这一年，说是学生，书早就读完了，也不读书了。说不是学生，还没分配，还没参加工作，更没拿到工资。内心的那份焦急，是实实在在的。只是大家觉得很无奈，也不敢大声说，怕被人说成对文革的不满。

7字班8字班的低班同学，他们也很同情6字班的。因为6字班能不能分配，与他们的关系大着呢。6字班不毕业，他们就更甭想毕业。总没有大闺女还没嫁出去，让二闺女三闺女先出嫁的道理吧？

“毕业生串联会”是由数力系6字班的石福庆发起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干劲也很足，居然把北京市几个高校的毕业分配串联会串成了校际的串联会。到8月份，还真的拿到了中央《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的文件。

学校被两派瓜分着、割裂着。石福庆明白，没有两派的支持，是搞不成毕业分配的。他“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15]开联合会议。414总部研究了此事，认为这是一件与毕业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应该解决的事情，所以决定给予支持。这样，在校、系、专业各级成立了由干部、教师、学生参加的团四两派基本按对等原则组成的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我作为414的代表参加了校领导小组。

应届毕业生要分配了。这对团派的影响不大，因为团派总部的核心委员都不是6字班的（只有李国柱是电6的，但他只是一般的总部委员）。对414的影响超级大。414总部的核心组中，有我、陈楚三、刘万章、蒋南峰、陈家国等几位都是6字班的，人数超过一半。总部委员中，周泉纓、王永县等几位也是6字班的。要是这些人都分配离校的话，414的领导力量将损失惨重。为此，总部决定6字班的总部委员都要尽可能地争取留校。

对毕业分配领导小组来说，所幸的是6字班的分配方案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下达到高校和用人单位。分配小组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对号入座，落实到人。

我没有具体参与分配工作，也不怎么关心自己的去向。因为我被动员考研究生，就知道是留校的，所以已经有了留校的思想准备。再加上两派斗争正如火如荼，我也不可能要求离开学校扔下414拍拍屁股走人。



文革前，清华留校的一般都是在政治上或学习上优秀的学生。那时留校当教师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到了1967年，热衷留校的人已经不多了。通过一年多的文革，尤其是毛泽东把教育战线定性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家对高校避之犹恐不及，对留校已没多大兴趣。在二千多名6字班毕业生中，原分配计划有140人留校的，最后只有40多人愿意留校，其他的名额都“浪费”了。

我班也是一样。原计划有两个留校名额的，我算一个，那么团派还可以有一个留校的。结果，他们宁愿去四川贵州等三线厂，也没有人愿意留校。

本来沈如槐很担心因为6字班的毕业分配会导致414领导层流失一多半，最后因为留校名额无人竞争，几乎所有的6字班总部委员都没费太大的周折全留下来了。

在毕业分配期间，石福庆找到我，说清华学生的大字报，无论政论水平还是写作技巧，都盖过不少著名的文科大学，在社会上都出名了。《新华社》想在清华的应届毕业生中物色文笔比较过硬的红卫兵小将做记者，问我愿不愿意去。我问他，你怎么想到我来了？他开玩笑说，谁叫你的《少数赞》“臭名远扬”的呀。

《新华社》到以理工科见长没有新闻专业的清华来招募记者，这在当年也算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我对自己做了一个粗浅的评估。

虽然我喜欢写点什么，但是我深知，我的笔杆子一点都不过硬。我不是那种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的人。我只有在自己特别想写的时候，也就是有写作冲动的时候，才可能写出一点比较感人、能引起共鸣的小文章。但是，《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这些都是党的喉舌，发出的都是党的声音，阐述的都是党的观点。像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要写听命文字，我是既写不出，也写不好的。即使写也会写得很痛苦。

另外，虽然我喜欢写点东西，但是从来没想到把写文章当作我今后的职业。我读了六年大学，有自己的专业。我还是喜欢搞技术工作。我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搞新闻。舍弃本行，进到一个我没有基础没有长处的新闻行业，我没这样的兴趣和胆量。

想过以后，我回答石福庆，说我不想去《新华社》。他很为我惋惜，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进中央单位的好机会。

于是，石福庆去找了另外一个同学，他就是动农系的杨继绳。杨继绳是党员，团支书，政治条件很好。他本来是要分配到一家大型坦克制造厂去的，但是还没有去报到。听说要他去《新华社》当记者，后来调令也下来了，他还是很犹豫，并不是特别想去。这时团派听说《新华社》要调一个老四去当记者，不高兴了，于是扣着调令不放。杨继绳班上的老四得知此事十分气愤，他们想办法把调令弄了出来。1967年12月份，杨继绳班里“云水怒”战斗组的几个同学推推拉拉地把他拉扯到《新华社》去报到，说你不愿干，先占上名额，免得被老团占了。就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杨继绳做了《新华社》记者。

多年以后，石福庆问我，当年没去《新华社》后悔不？我说，从没后悔过。他说：我说句老实话吧，你要是去了可能不会比杨继绳干得更好。我说：这点我完全承认，准确地说，应该是不可能比杨继绳干得更好。我自嘲说，我没别的优点，只有一点长处，就是多少有点自知之明，知道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没去《新华社》，中国少了一个平庸的记者，这是幸事。杨继绳去了，体制里出了一位有良知的新闻人，这更是幸事！

杨继绳自己说过，他在新闻界从业三十年，第一个十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第二个十年，他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第三个十年，他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三真”成了他的追求和座右铭。我看过他写的《墓碑》、《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等大作，也看过他写的多篇时政评论。在这些著作中，我听到了他的心声：“在权力面前说真话”。

能在风云诡譎无常权谋狡诈充斥的体制中生存下来，不易。能在如同污泥一般的官场环境中仍保持一个人的正直和良知并且有不凡的作为，那是更加的不易。

杨继绳做到了，令我敬佩！

我前后几届的清华校友中，官至高位、权至顶层者大有人在。那些从辅导员制度中培养出来的领导人，除了维护体制利益，没有更多的大作为。不是平庸，就是守旧。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都远远不及杨继绳。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

【难忘岁月】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

• 孙 耘 •

（上接 z k 1 3 1 0 c）

Y：后来罗老师一家遭遇了更大的灾难，就是他弟弟罗征敷致死事件。文革研究者和清华同学的不少文章里都提到这个事件，版本多有不同。我觉得，你作为当事人，应该说说清楚。

S：罗老师一家的灾难是我们造成的，心中的悔恨和歉疚几十年来未曾减退。就事件本身而言，面对别人的说法我感到很为难。他们的描述多来自道听途说，我如果重提此事又担心引起罗老师一家悲痛的回忆，所以只能保持沉默。近些年多次与罗老师晤谈，历经人生磨难的他非常豁达，我内心很感宽慰。况且，梳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也不可能绕开这件事，就借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一说。

1968年3月上旬，因担心化学馆不安全，就将专案组转移到清华在八达岭的避暑地三堡，并由代表队负责保卫。罗征启凭借头脑清晰和地形熟悉在27日夜间跳窗逃跑，尽管腿脚摔伤，最终还是逃出了三堡。

3月24日继“王关戚”倒台之后又揪出“杨余傅”，对文革的前景大家都感到迷茫。在校内，我们搞到罗征启的“活材料”，抓了他们的“现行”，就等于掐到414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所以很有些得意。没想到大意失荆州，我们只好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由保卫组和代表队继续抓捕，另一方面准备开批判大会发通缉令，抛材料、造声势压制414。我曾拿着材料找到海军宣传队办公室负责人胡保清，要求他们支持发通缉抓捕。他只能含混地回答：

是反革命就要抓嘛。不敢明确表示反对。保卫组和代表队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侦察、抓人的手法也更纯熟。为了找到罗征启踪迹，还抓过他老父亲及同学林维南。我们自恃抓反革命是革命行动，就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蛮干，头脑膨胀、无法无天，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话，“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听到代表队那些人讲述跟踪、蹲守、化装查访等活动，感到新鲜、刺激，就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抓林维南那次我去了，没有进屋，只在楼道下边观看。强行带走林维南时，屋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后来听说，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前些年我问过罗老师，得知林维南一家作为华侨已离开大陆多年。我无缘与林维南先生见面，只有借此机会向他及他们全家表示我真诚的歉疚之意，祈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Y：说到这里，看你的心情很沉重。其实，你参与抓人行动好像也挺偶然。

S：怎么说呢，现在人们喜欢说“偶然创造历史”，但哲学家又告诉我们，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我认为后者更深刻，更本质，也就更真实。

当时，罗征启逃跑后被414朋友保护在科学馆里，我们不可能抓到。按照既定计划，抓不到人就发通缉令造声势，而印通缉令缺照片，因为他们在清华的小家已经坚壁清野了，于是决定去城里他父亲家抄照片。

4月3日晚，我们一行9人乘坐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出发。这种车体型较大，两排靠边的长板凳可以挤下8个人。当时罗家被驱赶到北京站附近一个平房小院的偏房居住。车在院门外停下，留下司机小李和张××、王××两位同学。我带人进屋，有人找照片，有人宣讲“政策”，有人哄骗他的小弟弟。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拿着一本相册出大门时被告知：抓到罗征启弟弟了。我上车后见到一人俯卧在车厢中央，开车后将他翻过身来，才看到他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心里不免打鼓，就让打开后面篷布通通风。车回到保卫组所在地甲所，几个人抬着他下车，放到地板上就开始做人工呼吸。我心知不妙，赶紧找来刘汉忠医生。他略作检查，就摇摇头委婉地说：脉几乎摸不出来了，赶紧送医院吧。我急忙从总部会议上叫出陈继芳和王良生，说明情况，一起前往北医三院。到三院时人家不接收，只开出“人已死亡”的证明，这时大约是晚上11点钟。闻讯我们很为震惊：人命关天哪。可是我们想不出什么原因能导致死亡，会不会因心脏病？遂决定马上去卫戍区报案（因公安局已被军管）。夜半时分，一位领导出来接见，听了事情的过程汇报，就问：谁是带队的？我说：是我。他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又在抓人的张××、王××名字上画了圈，然后说：这三个人留下，别的人都回去吧。第二天早上把我们三人一起送到半步桥看守所。

在拘留审查中我们都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公安局很快就弄清了案情。实际情况是，当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留在车上的张、王两人发现了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于是就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他们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上，绑缚双手，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就向他口中堵棉纱。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孔道，窒息死亡”。根据这个情节，军代表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我心里明白，人命关天，即使强调动机是“抓反革命”，也不能随意伤害生命。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既敢为，就得敢当；况且，出于责任和义气，作为头头还应该多承担责任。抱着这样的心态，初进班房时尽管杂念很多，我还能表现得比较从容冷静，而且像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者一样，总要写点不合辙的诗文激励自己。

我深知，罗征敷之死给他本人和全家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几十年来，我的愧疚和悔罪，我所接受的惩罚，都无法弥补其万一。尽管罗老师代表全家多次表示了原谅之意，但我无法心安理得，无法原谅自己。我和孙怒涛一样，也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唯有努力行好事作好人，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实际行动去赎罪，以不负死者和生者。

Y：真是人间的悲剧，惨痛的教训呀。请继续往下谈。

S：5月9日蒯大富带人去探监，即所谓“冲击公安局七处”。见面时他告诉我，公安局要求扣下王××，放我俩回去。但蒯坚持：我送去三个人，你也得还我三个人。蒯大富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还说：如果需要留下一个人，就留我。

那时有一个新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我们三人先后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参加公安局办的学习班。直到7.27工宣队入主清华以后，8月29日把我们三人一同送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9月中旬，王××与几十名有各种问题的同学一起被送往沙城，当时的说法是“暂不分配，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发生活费，等待分配”，实际上是由北京师院的学生对他们监督审查改造。1970年王××才正式分配到河北省宁晋县。我和张××与部分七、八字班同学一起，于1968年12月底分配。孙铮随我一起“发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到海拉尔报到时遭遇零下45度的超低温，一片雾蒙蒙的冰天雪地，或许已预示着未来的日子将被严寒所笼罩。

Y：这么说，你没有参加清华的百日大武斗了。

S：罗征敷事件让我躲过了“百日武斗”。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幸运。依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和常德的体验，会与陈继芳、王良生、王子瑜等人一起，主张通过搞专案挖“现行”材料，从政治上打垮414，而不赞成采取武斗方式。然而，一旦武斗发生，又绝不会当逃兵。我的这一劫恐怕在数难逃。

罗征敷事件对清华文革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是两派斗争中第一件命案，强烈刺激了414群众，大大激化了两派矛盾，催发了20天后的“百日武斗”。同时，它对“罗文李饶专案”的形成也起了催化作用。我们进班房的三人都是校体育代表队的成员，当传出可能判刑的消息后，以代表队成员为主导的专案组自然更为着急，就力图把“现行反革命案”做实做死，以减轻我们的罪责。我总觉得，这是他们扩大为罗文李饶专案并大搞逼供信的一个心理原因。因此，我同样愧对专案中受迫害的老师、同学，尽管我没有直接伤害他们。专案组的许多成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影响了出国、入党、提升，甚至背负着“三种人”、“严重政治错误”等罪名。对他们，我总有一些歉意。

专案组成员、校足球队的前锋在5.30武斗中摔伤致高位截瘫，专案组和代表队的二十多位同学在毕业后按每年一个月安排寄生活费，连续18年没有间断，直到他1985年去世。小时英年早逝，没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令人十分惋惜。2007年“二闲堂”主编唯一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时作隆武斗受伤的事，我曾以“北南”的笔名简单记述了小时后来的经历，发表在该网站“四十年细说从头”栏目。

Y：今天你说了不少表示愧疚和道歉的话。这些话一定是你早就想说的吧。

S：有些话的确憋在心中很长时间了，有些则是近几年在清华两派反思氛围里的新体会。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解剖自己”，进而解释自己，真诚地说服自己，然后才可能去说服别人。我达不到鲁迅的境界，只有努力学习他的精神。

Y：听说你毕业后的经历也很坎坷，可不可以简单谈谈？

S：我和孙铮一起分配到海拉尔通用机械厂，我当车工，孙铮搞电机装配。1968年底正是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即所谓“挖肃”运动的高潮。外来大学生天然清白，是依靠力量，北大法律系的小汪已成为专案组的骨干。我报到不久，厂革委会就让我进专案组。我无法坚辞不干，好在已有清华的经验教训，迅即发现所谓“挖肃”完全是搞逼供信。口供材料犹如滚雪球般咬来咬去，共产党居然都成了内人党，怎能经得起推敲？我的意见被指责为“右倾”，很快将我和赞同者踢出专案组。这样，我不但避免了再陷泥潭，而且得到全厂上下的好评和关照。相反，有些刚分配去的大学生和插队知青就陷了进去。可见，从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往往更深刻也更有价值。

1970年秋，迟群谢静宜主政的清华开始大张旗鼓地清查5.16，启动虽晚，而气势更猛。工宣队通过逼供信获得口供，将井冈山兵团打成“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时校内人人自危，校外数百名已分配的学生受到“隔离审查”，其中几十名被陆续揪回学校。10月底，以开四届人大准备会的名义将蒯大富骗回学校。1971年2月9日，我在工作中被三位解放军带走，于11日回到学校，隔离在东主楼八区。迟群与我个别谈话，说我民愤极大，威胁要依法制裁，诱导我交待“5.16组织问题”。谁都知道，迟群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那几天我压力极大，甚至动过自杀念头。实际上，当时许多审查对象都有过类似想法，比如关在我对门的一位女实验员就喝过敌敌畏。校内自杀身亡者有四名，我知道其中三位都是团派骨干。物0的栗乃志在审查中跳楼身亡。总部委员、老工人韩启明更悲惨。他本已调回河南老家，又被揪回学校，因不堪重压，逃到电厂外小河边割开股动脉。听说，工宣队赶到现场时他的血尚未流尽，挣扎着一口气对军代表惠宪钧说：老惠，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以“智擒王光美”而知名的“捉鬼队”伤亡更惨重。陈贯良在清华的江西鲤鱼洲农场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未死，被讥笑为“火烧屁股”，后来在两人陪护当中突然钻到拖拉机后轮之下，终于如愿以偿。分配在苏州的李介谦是捉鬼队头头之一，在当地审查中“自杀”身亡，详情不明。分配到各地的清华同学到底有多少人挨整，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自杀，至今仍不清楚。从校友网不断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个数字肯定是出乎意料的。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本来就子虚乌有，当然搞不下去，迟群赶紧中止从外地揪人，转而强调“5.16罪行”。实际上，早在1970年11月周恩来就说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这样，将我文革中的事又翻腾一遍，找不到足够的“5.16罪行”，最后还回到罗征敷事件上重新定案。

Y：这第二次审查有多长时间？怎么给你定案的？

S：1971年9.13事件以后清查运动就逐步停止了，其后陆续将揪回学校的人作结论，送回原单位。1973年5月18日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全校“宽严大会”处理命案，从严者当场逮捕法办。然后回到主楼后厅开全系大会，对我宣布“复审结论”。一个新鲜的说法叫做“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就是暂不戴五类分子帽子，送回原单位，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至此，我在清华审查了2年零4个月。当天工宣队集中处理了武斗期间的全部命案问题，共涉及12个人。

Y：你在学校审查了2年多，政治上受到巨大打击，想必有很多感触了。

S：和许多同学一样，我的思想变化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从1968年秋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领域开始，文革的群众运动阶段宣告结束。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再次举起“斗批改”大旗，以斗立威，以批固权，自上而下连续发动了几轮政治运动。

第一轮叫“清理阶级队伍”，是共产党立威的惯例。矛头对着平民百姓，40岁以上人人过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数字肯定是惊人的。据唐少杰老师调查，清华在清队期间自杀24人，超过工作组时期和百日武斗。

第二轮随后跟上，1970年1月“一打三反”登场，借“落实战备”之名，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打三反开创了公开、成批枪毙政治犯——其实绝大多数只是“思想犯”的恶劣先例，还将杀人权下放到省一级，致“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一大批思想先驱者死于枪口之下，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等。很多地方借机清算武斗旧账，枪毙了一些失势的造反派头头。湖南常德水运公司“海总”头头郭大副就被处决。

在一片肃杀气氛中，1970年3月2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造反派统统划归为5.16，制造了涉及近千万人的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直到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的9.13事件，政治重心转移，这个运动才告一段落。当年“三结合”在台上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出于派性充当了整人的打手和

帮凶。然而，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揭批查”运动中，他们同样遭到清算。

清查5.16运动对我来说是个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我见识了迟群这位御林军小头目的嘴脸，体验了被打入深渊的滋味，知道了秋后算账的厉害。我想不明白，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干革命，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文革中台上人如走马灯般轮换，台下你整我、我整你，到底是为什么？不久以后，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43年前的28团团长，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林副主席竟然仓惶出逃丧命异乡。我的头脑中犹如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又好像一桶冰水浇头，通身凉透却使我骤然清醒。我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思考政治以及有关文革的方方面面。总之，这是我思想解放的开端。

在海拉尔工厂的几年里，我亲眼看到文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了解到工人群众对文革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看法。他们对我的理解、同情和帮助就隐含着朴素的批判因素。1976年4.5事件时，我厂毛吉昌、刘永杰两位书记特意叫我到办公室，闭门议论形势。大家很有共识，为天安门的革命行动叫好，反感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那时，我已从文革的坚定拥护者转变为理性的批判者。

Y：不少人都有类似的转变过程。1973年回到厂里以后怎么监管你的？

S：回到海拉尔，我由车工改为大炉工、翻砂匠，以利劳动改造。人家老工人对我没有丝毫歧视，反而处处照应。我体会到工人群众的纯朴可爱，与他们成为朋友，友谊延续几十年至今。1975年，市委派毛吉昌到我厂代职当书记。文革前夕他作为团市委书记正在中央团校学习，曾派到清华园中学当工作组，对北京和清华的文革有所了解，政策水平也较高。在他任职期间，于1976年4月解除我的群众监督，算是“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同时安排我到科室，从事新产品开发等技术工作。

Y：这就是说，从1968年4月事发后将近十年中，对你已经做过3次处理。

S：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政治的险恶和肮脏，对我的打击之重自不待说。幸而我牢记先贤的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吾日三省吾身。作人做事要换位思考，你涉及人命关天的重案，受些惩罚岂不应该？自己做事自己当，何必怨天尤人？所以我的心态还算平稳。上帝是公正的，施以惩罚的同时还让命运之神赐福于你。在我危难之际，孙铮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不离不弃，在我监改期间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不久又添了一个小千金。周围的群众，从领导到工人，对我都抱有理解、同情、甚至怜悯，经常施以援手，让我在严寒的边陲感受到人间的温暖。那个时代受挫挨整的人很多，各有不同的体验。我的感受是：上天很公平，世间好人多。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

Y：你在1976年解除了群众监督，那个龙年是多事之秋：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直到一举粉碎四人帮。你的生活该有新的改变了。

S：随着四人帮戏剧性地倒台，长达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继而邓小平上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当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有救了；忧的是，政治经验告诉我，恐怕会重算文革这笔老账。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蠢蠢欲动”，于是跟着电台学英语，在给青工辅导高考的同时复习大学基础课，谋划着准备着，寻找机会离开寒冷的北国，以图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1978年春季，从清华传来新一轮讨伐声。我知道，该来的终于要来了。我们把母亲和小女儿送回天津老家，早早做好应急准备。4月19日，五大领袖被正式逮捕，一场“揭批查”运动势如燎原，不出一个月，全国就滚雪球般抓了数万人。中央见状，又急令刹车。过了两个多月，我心想这一轮算躲过去了，但往后还难说，因为北京的吴德正被炮轰，如果新官上任还难免再烧三把火。果不其然，不久林乎加调京接替了吴德，他的三把火把我再一次烧进班房。

Y：这就是你第二次进班房了，在什么时候？

S：1978年10月份，我和孙铮参加了哈工大进修班（俗称“回炉班”）考试。回来后不久，11月13日，我就被拘留审查，按照行话，这叫“二进宫”，班房里的囚犯都高看你一

眼。刚关进看守所，心绪烦乱，看看眼前，再想想未知的未来，我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渐渐平复，等待着解往京城。然而，等来的只是一次例行审问，让我把学校那些事重写一遍，此后就无人问津了。

1979年春节过后，孙铮前来探视，告知我俩都考上了回炉班，她准备去哈工大报到。送走孙铮，我心绪稍安。其后十几个月中，海拉尔的许多朋友代替孙铮照顾我，无家胜于有家，我收到的食品数量最多，有些至今尚不知何人所赐。

拘留期间，我坚持偷偷写日记，背诵读过的诗词，靠记忆和推理复习高等数学等，后来又争取到学英语和其他功课的机会。我再次领悟到，只要站得直、行得正，你就终会感动上帝。一位眉清目秀的解放军小李班长对我格外关照，还出钱给我买来字典。我出狱时他已复员，竟没能还钱和当面致谢。就这样，我把看守所变成自己的学校，不但学习文化知识，还学到不少社会知识。

孙铮到哈工大后，汇报了我的情况，学校十分通情达理，答应为我保留学籍，让我们感到很温暖，看到了希望。然而案子的一拖再拖却让我不断地由希望转而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煎熬中一年就过去了。1980年寒假，孙铮在朋友的帮助下多方奔走申诉，海拉尔公安局终于在2月8日将我释放，名曰“取保候审”，电机厂书记刘永杰以个人名义签字担保。至此，近15个月的牢狱生活宣告结束。

Y：不过，取保候审意味着事情还没完结。

S：是啊，所以我马上请假，在春节前回到家中。孙铮告诉我，河北宁晋县王××的专案组早在半年前就直接找过罗征启。当时罗老师刚刚提升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姿态很高，表示“永远不再追究”，还强调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代表全家。于是王××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商量先由孙铮直接找罗老师谈。罗老师在清华的工字厅接待了孙铮，指点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让海拉尔派人来清华，征询对孙耘的处理意见，剩下的事我来办，你们就不用管了。”他的话给我们很大安慰和信心。罗老师还支持我报考哈工大研究生，将黄美来老师编写的政治复习资料寄给我作参考。当年黄老师并不知此事，特在此向黄美来老师表示感谢。

Y：原来你还不是第一个得到他恩惠的人。罗征启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S：罗老师对文革早就有深刻的反思，他是一个理性的思想者，这样的举动绝非一时头脑发热。

我回到海拉尔，将罗老师的意思转达给公安局，经海拉尔市委批准，指派一位副局长带队前往北京。同时，我报考了哈工大自动化仪表专业研究生，厂里给我长假，让我专心在家复习备考。短短40天要准备5门功课，时间显然不够。我下定决心，拼命一搏。4月4日在海拉尔一中考试，我感觉题目不难。一个月后，哈尔滨传来消息，我的成绩是415.75分，总分和数学、英语都是第一名。哈工大拟录取并来函调档案。时间很凑巧，海拉尔市公安局经市委批准于5月27日对我的问题做出结论：同意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党委和被害人家属意见，“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给予适当行政处分。文件下发到我们厂，刚调来几个月的书记张崇才对我很同情，依据他的经验，最好不要背一个行政处分，就做出“取消其此次调资升级资格，免于行政处分”的处理决定。实际上，那次调资升级名额为40%，按常理我和孙铮也只能上去一个人。正是因为没有行政处分，12年后的1992年，海拉尔市公安局重新下文详细记述我的问题与处理经过，并按照最高检察院文件补发了拘留期间的工资和取暖费共一千多元。

Y：你获得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照，说明人同此心，看出了人心向背。

S：1980年6月上旬，我的档案转往哈工大。与此同时，与我同命相连的井岗山也从吉林报考哈工大。我与井岗山素不相识，只知道他是“北航红旗”二把手，曾跟随谢富治、王力去武汉，因7.20事件而闻名全国。冥冥之中，我和井岗山的互动成就了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

Y：你是说胡耀邦批示你们读研究生的事吧。请讲讲具体过程。

S：7月初，哈工大校党委研究我俩的录取问题，结果常委们意见不一，8对1，只有一人赞成。当时哈工大由副校长刘仲甫主持工作。巧的是刘仲甫与井岗山的父亲光复后同在黑龙江鹤立县当领导，两家关系很密切。常委会那关键的赞同票正是刘仲甫的。7月21日校党委以“有不同意见”为由向省委请示能否录取。据说省委书记们意见也不统一，因为涉及政策性问题，遂指示哈工大派人到北京请示。8月份，哈工大派人事处副处长金光和研究生科科长王舜两位老师赴京。刘校长当然最希望录取井岗山，不过我和井岗山已经牢牢绑在了一起，除政策问题外，一个说得出去、也可能说服别人的理由就是我考第一，而且成绩遥遥领先。

Y：真是无巧不成书。你和井岗山就这样在冥冥之中互动了。

S：我闻知哈工大的否定结果后给省委写了信，又到北京继续向各方申诉。厂里特意给我和孙铮一个去呼和浩特办事的差事。到京后我们首先拜访了罗老师，是我文革后第一次与他见面。随后他就给省招办和哈工大写了一封信，表明赞成录取的态度。我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通过亲朋好友给哈工大老领导李昌，给五届人大代表黄火青等送申诉材料，最后还给胡耀邦写了信。

哈工大的两位老师十分负责。到北京后他们先到清华找罗征启。罗老师态度鲜明，给他们看了那封信。信中恳切地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清华党委里林克、胡启立、汪家璆等大多数成员支持罗征启，明确表态赞成录取。然而在北航他们碰了一鼻子灰。两位老师没有气馁，先后找了高教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最后，经人指点找到负责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9月4日，阎草副主任听取了汇报，收下了材料。当天书记处开会，中纪委王鹤寿书记便向胡耀邦汇报了这件事。胡耀邦看了材料，当场做出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我不知道胡耀邦总书记是否看过我的申诉信，但我知道，他这样雷厉风行地批示，决不是随意表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他一贯理念的必然行为。关于胡耀邦批示的四句话，罗老师当年告诉过我，我记得大意是不差的。井岗山的老同学戴维堤、尹聚平夫妇在其回忆录《逝者如斯》中生动、清晰地描述了在阎草家看到胡耀邦亲笔批示的情景。

中纪委迅速落实总书记批示，向清华和北航作了传达，同时邀集高教部、新华社和哈工大组成调查组，分赴吉林市和海拉尔市考察我俩的工作表现，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就走例行程序：调查组向省委汇报，汇集各方意见，建议录取；随后哈工大党委议决：同意录取；9月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同意录取，并向书记处和王鹤寿、胡耀邦同志报告；书记处批复之后才发出录取通知书。

10月中旬，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来到哈工大才见到井岗山本人。我和孙铮终于在哈尔滨团聚了。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Y：这新一页揭开得真不容易，有那么多巧合，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你。

S：我的确是幸运的。据我所知，在全国众多造反派学生中，经胡耀邦正式批示读研究生的仅此一例。此前78、79级研究生招生时也有类似情况，他们就没有我俩的运气了。

我感谢罗征启，也感谢哈工大和清华那些老师、干部；我感谢胡耀邦，也感谢黑龙江省、北京市和中纪委的各级领导，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顺应了社会潮流和人心向背。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这种必然来自全国上下对文革的反思，来自团结一致向前看、往前走的朴素愿望。

当时我们做了两手准备，同时寻找可能的接收单位，研究生上不成就调动工作。我们听说华中工学院的书记朱九思是大胆的改革家，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就通过武汉的友人送去材料，等我回到海拉尔时已收到华工发来的商调函。如果哈工大不能录取，我就将去华中工学院工作。朱九思思想开放，敢作敢当，还接收了在清华整得很惨，“帽子”尚未完全摘掉的陶德坚老师。

Y：胡耀邦的确是最具变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领袖人物。

S：对胡耀邦总书记我充满感激之情。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我悲愤之极，在哈工大设的灵堂前徘徊许久，出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没能献上自己的一束鲜花，留下终生遗憾。2009年3月底，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为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实现近30年的夙愿，我们夫妇二人专程赴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墓，到浏阳瞻仰胡耀邦故居。在胡耀邦墓前，我诵读了祭辞：

泱泱中华 朗朗乾坤 幸生耀邦 千古一人
心系天下 施惠于民 平反冤案 颠倒昆仑
“人才难得 既往不咎” 关爱我辈 将心比心
人格高尚 党之“良心” 人性光辉 岿然永存

4月7日，我第一次受邀参加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座谈会。发言中谈到耀邦同志对我的恩惠，多年的情感突然迸发，以致泪流不止无法自制。会上我着重谈了一个观点。当代人制史论今，常被现时的权势、名声所左右，只有历经时间的淘洗，光环褪去，后人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客观。比如，一提到“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刘少奇、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固然这是些大案要案，但我认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胡耀邦从朴素的人性出发，拿出非凡的魄力，顺势推动对数十万“右派”的“改正”；进而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摘帽；“家庭出身”作为与生俱来的原罪被一笔勾销。试想，除了胡耀邦，谁能做出这个“顺势推动”之举？这个一风吹吹掉了中国的现代种姓制度，从根本上颠覆了封建色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最重大的历史性进步。特别是，这个伟大的行动发生在中华民族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真正起到“颠倒昆仑、扭转乾坤”的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这场平冤案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惠及全国数亿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其规模之大“前无古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胡耀邦是“千古一人”。我相信，后人对他的评价将不会低于，甚至超过毛泽东、邓小平。

Y：你的评价很有意思，或许掺进去你个人的感情因素吧。

S：我不否认对胡耀邦有感恩之心。我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但我一直在观察、学习，加上独立思考，可能思维方式还跳不出科学逻辑的框框。你看我很会考试，说明我是个“求甚解”的人。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似是而非，我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严肃认真的。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Y：看得出你是个认真的人。到哈工大读研和工作应该比较顺利了吧。

S：总的来说是越来越顺利了。哈工大的小环境不错，老师同学待我都很好，但大的政治形势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摆脱不掉。我到哈工大后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公审四人帮。政治形势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我暗自思忖，如果早在暑假期间宣布这个消息，我们这研究生还上得成吗？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叹世事的无常和我们的幸运。

公审四人帮以后，1982年开始了“清理三种人”，即整肃“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个模糊的定义可适用于任何造反派。“二十年内不搞运动”的承诺犹然在耳，新一轮运动已展开。然而搞政治运动毕竟已不得人心，像哈工大就没有多大动静。这是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又一个进步。

可是，我注定躲不开政治的漩涡，它会自动找到你。1983年研究生毕业面临分配，当时哈工大刚刚转归七机部（航天部）领导，主管部门坚持要将我和井岗山“不予分配，退回

原单位”。经过我们的坚持、老师们的支援和学校的反复交涉，最终七机部做出妥协，同意我留校；同意井岗山进北京，但不能进七机部，可以自己找接收单位。后来他去了北京化纤学院（现服装学院）经管系。

Y：噢，你年岁不大，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了。

S：这个调侃的词汇说来轻松，但是当“运动员”的滋味一般人体体会不到。孙铮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作记录员，清华来函要求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哈工大管理学院的总支书记罗家骧亲自出马外调，找到多位当事人，否定了那些重磅材料，最后按“一般错误”收场。罗家骧在清华听到一则消息，“清理三种人”当中清华向外发函涉及三、四百人之多，大多要求定“严重错误”以上的罪名。罗书记对清华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哪儿有这么多“严重错误”？

那段时间我接待过直接或间接来自清华的外调好多次，有两件事印象最深。其一涉及到陈继芳。陈继芳是团派主持“解放干部”的总管，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在清查5.16时就受到很大冲击，亏得怀孕六个月才没被揪回学校。这一次能放过她吗？专案组说：薄一波讲过，“清华井冈山都到哪里去了？”长春一汽的专案组两次找我调查。第一次来人态度很好，第二次换了个年轻人，态度恶劣。他拿出几张复印件，指着说：你以前写过的材料还不认账吗？想让我照抄一遍作证言。我一看，是十几年前清查5.16时的交待材料。我一下子火了，高声质问他：“你知道这些材料是哪儿来的吗？你知道清查5.16是怎么回事吗？知道清华有多少人挨整，多少人自杀吗？你知道中央早就宣布那是冤假错案，要求销毁黑材料吗？…你拿张纸来，我给你写。”我未加思索，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一份证言：

看到这些清查5.16时的所谓材料，我十分震惊和气愤。在迟群操控下，清华的清查5.16运动波及数千名师生员工，有四人自杀身亡，是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中央早已定性并明令销毁相关材料。鉴此，我郑重声明：这些材料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我一概不承认。除了对材料中所涉及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歉意以外，谁使用这些材料谁就要负政治责任。

写完后我签上字就摔门而去，情急之下竟然忘记抄一份底稿，但其内容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陈继芳对我说，虽然长春一汽核查办人员没能从我和王良生那儿拿到他们想要的材料，难以向上级交差，但是我们这批清华同学不屈服于薄一波等人淫威的胆量和智慧，却让他们由衷地感到佩服。

还有一次在系总支办公室接待清华的几位老师。刚坐定，一位领头的老师就说：我们来是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你要如实回答。至于你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先不谈…。这本是一种审问的套话，但我一听就窜起一股无名火，当即打断他的话：你说我还有什么问题？…。这样一来二去居然吵了起来。后来他们提到罗征启，我头脑才冷静了下来。其实我明白，这种过激反应是我的“运动后遗症”，往往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件小事，触动了某个心结，就会突然火冒三丈，情绪无法控制。于是，我检讨了两句就开始对话。他们外调的目的是整团派的几位政治课教师，非要说我们搞专案、抓反革命是听了他们的“教唆”。实际上，文革中团派的学生都自认为“路线觉悟”很高，自行其是，从不理会干部教师的意见。况且，同一派的教师与学生发表相同的见解亦十分正常，根本没有教唆之类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不可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这件事让我想起一句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偏见显然来自派性，然而为什么清华的派性那么顽固，那么强烈，其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呢？

Y：清华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过去有骄人的历史，文革中有激烈的争斗，直到今天又有“大清帝国”一说，在国内大专院校中确实独树一帜。

S：以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比较，就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而言，清华与哈工大、华工这些学校大不相同。“红教联”陶德坚老师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证。

文革一代清华人没有不知道红教联的，那是个“牛鬼蛇神大杂烩”，是“右派翻天”的典型。红教联连同它的发起人陶德坚老师早就被批得臭不可闻，以至四十年后的今天不少干部教师还要与红教联划清界限。

查看大事记，1966年10月28日，在地质学院造反教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清华大学

红教联”宣告成立。12月12日，“红教联”扩充并更名为“红教工”，一度发展到近二百人。67年1月23日，红教工加入井冈山兵团。3月15日红教工解散，回本单位闹革命。红教联的历史沿革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唯有红教联的“臭名”延续至今。这是清华文革史上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我与红教联接触不多，与陶德坚本人也不很熟，印象中她是一位温和端庄、略显柔弱的年轻老师。陶德坚是414重点攻击对象，后来受“陈里宁案件”牵连，被团派“群众专政”。30多年后，在五柳村网站上看到陶老师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始知她已在1997年7月离开人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拼尽心血记录下自己的人生之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她的爱人陶世龙，即五柳村网站的创办人，近年回国住大女儿处，与我们同在一个小区，见面机会较多，因此，我对他们夫妇多了一些了解。

Y：你介绍一下陶德坚老师吧，她可算清华文革中的名人。

S：陶德坚十七八岁时，带着“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的理想，为圆自己的大学梦，从香港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怀着强国富民的梦想，一心跟共产党走，对未来的事业、生活、爱情都充满期待和幻想。尽管父亲是国民党员，陶老师还能很快入团入党，当上学生干部，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1953年8月陶德坚他们提前毕业。她作为唯一的党员拿着一摞档案，与九位同学一起从天津大学分配到清华建筑系。她刚到清华很受重用，担任系党支部宣传干事，参加了清理思想运动和肃反运动。然而，她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尤其缺少政治历练。1956年底，她听到几个天大同学对党支部的意见，就原原本本向支部书记刘小石反映，结果酿成“曹昌彬事件”，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在1957年又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在当时的党内整风中，陶老师对照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曹昌彬等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却被追加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她实在想不通，在刘小石跟前“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

“曹昌彬事件”发生在1956年冬季，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前，更在反右之前。当年10月底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蒋南翔反应迅速，马上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抓“裴多菲俱乐部”，在高校中起到示范作用。其次，曹昌彬他们只不过对刘小石的宗派主义有意见，说他对清华毕业的人亲近，对外校分来的疏远，根本不涉及党的大政方针和校党委的治校原则。深谙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蒋南翔却说他们“有纲领、有策略地进行反党活动，…企图篡夺党在建筑系的领导权”，让刘冰一棒子打下去，毫不留情，显然是借机作为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的重要步骤。事实上，反右时所谓重灾区，如政治课，物理、外语教研室等都是“外来户”集中之地。正因为文革前非清华出身的教师、干部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受压感，有些还受到直接打击，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多数参加到团派。

党内处分是个政治上的重大打击，但陶老师能够承受。她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搞业务的，遂在设计院继续努力工作，后来成为精密仪器机房防震领域的专家。陶德坚天资聪明，干活不要命，同事们一致评价她是个“能人”。

Y：文革中她必定也是能人了。

S：文革中的陶老师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紧跟党的领导，先后保蒋、保工作组，结果一错再错。她糊涂了，然而又开始清醒了。原来蒋南翔、工作组都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告诉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工作组撤销后，受到“十六条”的鼓舞和地质学院教师自发组织起来闹革命的影响，她挺身而出，在万马齐喑的清华教师队伍中，率先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组织“红教联”，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一个“漏网右派”牵头组织一伙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起来造反，在很多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是典型的“右派翻天”。红教联和陶德坚像是团派的软肋，先有一百五十多名干部联名写公开信要求蒯大富清除“陶德坚之流”，随后即成为414的首要攻击对象。罗征启老师坦率地承认：

4 1 4 是把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认为反动的言论（如“大翻个论”），都扣到陶德坚头上。

1 9 6 8 年春，江青、康生指名让抓陈里宁事件中“清华那几个坏人”，陶德坚老师被团派“群众专政”，关押了几个月。工宣队主政以后，陶老师更成为“全能运动员”，每一次政治风波都要抓她作为背后的阶级敌人。林彪倒台，她早年的学生借谈心之机鼓励她暴露思想，殊不知是惯用的引蛇出洞招法，她遂被批为林彪的社会基础。1 9 7 2 年清查 5. 1 6 收场后，她成为全校唯一一个“暂不戴帽子的 5. 1 6 反革命分子”，并被“清除出党”。1 9 7 4 年批林批孔时，因为“拒不认罪服罪，疯狂翻案，抗拒改造”，又给她加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并“交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又被批为邓小平、刘冰的社会基础。多年来，频繁批斗和劳动改造成为陶老师的家常便饭。

直到四人帮倒台，陶老师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不再扫厕所了；不必定期汇报思想了；进出清华园不需要专案组批准了。我无法想象，十年文革中陶老师被连续“专政”八年，在清华园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其间她经受了多少屈辱？遭受了多少摧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那瘦弱的身躯？

Y：后来在政治上给陶老师平反了吗？

S：文革结束后政治形势变化很快：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天翻地覆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且深感愤懑的是，在陈里宁释放并恢复党籍之后，在右派改正、曹昌彬们平反之后，对陶德坚的问题却继续拖延。直到 1 9 7 9 年底，经过上层的干预，校方才发还陶老师被扣的工资，并费尽心机拼凑出一个“复查结论”。结论中列举了“带头冲击专政机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系列错误言行”等罪名，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叫做“不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定为”三个字算清华的又一个创新。谁都明白，“不定为”不等于“不是”，只为留下一个“敌我矛盾”的暗扣，同时拒不解决被迟群开除党籍的问题。陶老师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字，并要求就有关事实对质。结果是不了了之。可叹清华人的高智商都用在玩弄整人的文字游戏上，不能不说这是母校的悲哀和耻辱。

陶老师以切肤之痛认识到：现在看来，蒋南翔造就的这台不漏气发动机还在起作用，如果想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1 9 8 2 年武汉华工的改革家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创建建筑学专业。曾为右派的周教授想到同命相联的陶德坚，予以推荐。朱校长毅然决定接收，后来还派组织部长去清华调取陶老师的文革档案，以便解决“开除党籍”的问题，但清华让这位部长坐了冷板凳。好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活有了重大变化，在华工，陶老师一直以没有“政治结论”的身份顺利工作，直到退休。

在回顾了自己的“风雨人生”之后，病榻上她一吐真情：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后记中她再次表示：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么顶撞，造成过什么伤害，均请各位予以谅解。陶德坚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 1 5 年了。建议我的同学们再去读读这短短 8 万字“素描式的人生画卷”，尽管读来颇感压抑，但你会有很多新的感悟。

Y：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S：在清华的政治氛围下，我认识的不少团派教师、干部，都像陶德坚那样选择了离开，包括一些正牌清华出身的。他们在社科院、北大、复旦等单位担当学术和行政领导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而当年与陶老师一起分配到清华的 1 0 名天大同学，最后只留下林贤光一人。

传统是无形的巨大力量，清华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可惜“新清华”还留下这样一个令人不齿的整人、排外传统。我真心希望，这个传统到我们这一代能寿终正寝。

Y：当年痛批过红教联和陶德坚的人，今天恐怕都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S：当然，人们的认识总在不断提高嘛。红教联的老对头“万山红”战斗组一位骨干教师就发过感慨：陶德坚死得太早了，好些事情她看在前头了。几年前，414的蒋南峰同学登门拜访林贤光夫妇，为1967年初的抄家行为鞠躬道歉。

414一把手沈如槐同学在自己的书中重新认识当年打击红教联的行为。后来在一次聚会上见到陶世龙先生，他当面表达了歉意。

孙怒涛在文中也写到陶德坚，而且鲜明地表示：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Y：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听说某位414派的老师讲过，“今天如果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参加红教联，也要‘彻底砸烂’”。

S：反思文革的课题很多。我们不妨仿照孙怒涛同学，从反问自己开始：你为什么自觉地投身文革（哪怕只有几个月）？你为什么参加某一派？几十年中你对自己和文革的认识有什么改变？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回答得清晰透彻却不那么容易。那些连篇累牍下笔万言的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更要先做好这些功课，起码要给自己一个让自己信服的回答。对亲历者而言，没有对自己的反思，你描绘的文革再生动再热闹，也势必有所扭曲和雕琢，更何谈深入的研究与恰当的评价？

前文指出，文革理论和行为充满了悖论和矛盾。毛泽东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特权阶层”问题。414某些朋友针对这个理论有精辟的见解：老四老团都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只不过老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老团强调“继续革命”。正如沈如槐指出的，毛泽东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悖论。党的官僚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专政工具，而“继续革命”又要打碎它，犹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定不会成功。时至今日，特权阶层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形势下变本加厉，体制性的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癌瘤。如今抛弃了“革命”而代之以“改革”，能否走出悖论的怪圈，结果将如何，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按统计分析，激进的造反派中以体制的批判者居多，他们大多在原有体制下（或某次运动中）受到压制或感到压抑，有一种变革体制的本能冲动。这种变革要求与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合拍，就产生了“彻底砸烂”的极左口号。激进派感到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遂成为崇拜、迷信毛泽东的真诚的“保皇派”。体制的批判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是文革的一大特征。老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激进的老团是“形左实右派”，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右派。相反，保守派和温和的造反派（如414）以抵制文革的偏右面目出现，本质上却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他们在批判文革的极左方面觉悟较早，同样具有某种代表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革中的左与右，与文革前传统意义上的左与右恰好是相背的。

文化革命群众运动阶段中，全国各地几乎都分裂成类似的两大派。研究两大派的形成、争斗和命运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简单贴上各种标签，比如“都是造反派，一概不用”，“跪着造反”，甚至有疯子、傻子、坏蛋、笨蛋之说，都无益于解读文革，也不利于认识现今的中国，更无从找到真正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Y：反思文革这个课题远没有完成。清华是不是还应该起点带头作用？

S：清华一直处于文革大潮的中心，清华学子素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虽然官方一直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我们清华人在厘清文革史、反思文革和两派和解方面却迈出较大的步伐，得到社会的肯定评价。当然，与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朋友相比，我们的认识水平还显得浮浅，视野还不够开阔。切实的亲身经历是我们反思文革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是我们的局限。

Y：你怎么看清华两派的和解？

S：当年两派之间的斗争发展为你死我活的“内战”，伤亡惨重，积怨很深，和解必定是漫

长的，渐进的，逐步积累的过程。我认为，今天两派的和解是反思文革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反思文革则是两派和解的思想基础。

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停止过对文革的思考。像罗征启老师，对文革的反思就更早更深刻。1980年他主动为我解脱，支持我考研究生，在清华树起一个样板。1987年蒯大富出狱后，在探亲途中受到各地同学的热情接待和关照，其中就有汲鹏等414的朋友。九十年代，在最具开放精神的深圳集合了众多清华精英，他们促成了蒯大富和沈如槐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进入新世纪，面对文革研究依旧被列为禁区，纪实文学、野史大兴其道的局面，清华学子又开始自己书写亲历的清华文革史，并有多篇著作问世。清华校友网上关于文革的回忆、思考和讨论多年来从未间断。在这种氛围下，两派一些骨干人物联手策划组织了2009年和2011年校庆期间较有规模的两次聚会。大家交流思想，坦诚相见，尽管还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毕竟坐到了一起，增加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开阔了彼此的视野，增进了反思文革的深度和广度。

正是在2011年卢沟桥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等414朋友，见证了团派头头崔兆喜向陈楚三鞠躬道歉的一幕。后来，我帮助孙怒涛联系韩爱晶，追寻“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其间我与孙怒涛的交流十分坦率，冲撞也不少，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今年春天，孙怒涛发来他的回忆录书稿，让我提意见。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而且很赞赏他的立意，所以真心实意地提了不少意见。他还希望我写点什么，我犹豫再三才答应下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和水平写书评，只能说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一篇广义的读后感，企望与大家共勉，如果真能成为引玉之砖，那就是份外的收获了。

Y：谢谢你说了这么多心里话。

S：更感谢你耐心听完我的讲述。最后要说明，因为我的大多数文字资料没能保留至今，以上提到的不少人和事，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请予谅解，并望知情者予以补正。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